

“有田—克莱琪协定”在中国的反响

——以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与评析为中心

闻黎明

(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大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92)

[关键词] 天津事件; 有田—克莱琪协定; 英日关系; 西南联大

[摘要] 1939年4月, 天津伪联合储备银行与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爱国人士刺死。日本以“天津事件”为由, 迫使英国在与日本举行的东京谈判中达成以中国利益换取缓冲英日关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一妥协性协议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 形成抗战以来国内首次对如何利用国际关系争取抗战胜利的讨论热潮。西南联合大学恰是透视这一讨论的载体, 这一协议在师生中引起了相当反响。他们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批判、对英日在华矛盾的分析、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等, 他们对英、日、中矛盾的冷静观察与预测, 透视出可以由此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中国民众对于国际变化与中国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

[中图分类号] K26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10)02-0075-08

Chinese Reaction to the“Craigie-Arita Declaration” ——Comments and Reviews from the Exper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WEN Li-ming

(Institute of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Yunnan, China)

Keywords: Tianjin Incident; Craigie-Arita Declaration; Anglo-Japan relations;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bstract: In April 1939, Cheng Xigeng, Superintendent of Tianjin United Reserve Bank and Custom, was assassinated by Chinese patriot, and Japan took this Tianjin Incident as an excuse to blockade leased territories of Tianjin, requesting the entry of Japanese police and relevant actions. After the demand was turned down, the first tension between UK and Japan since the Anti-Japanese War came into being. UK had to cope with Germany on the European battlefield while maintaining its rights here in China, therefore, UK, sacrificing Chinese interests, signed the Craigie-Arita Declaration with Japan during their discussion in Tokyo. Such compromise caused intense protest, initiating the first discussion on how to win the Anti-Japanese War util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revious historical studies look at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plomacy history, very seldom touching on the mass' public opinions and social reviews.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alyzing the reactions from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the criticism of UK, the conflict between UK and Japan in terms of their rights in China, how to win the war etc.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mass' observation and prediction of conflicts amongst UK, Japan and China, we have a better look at Chi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changes and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relations.

签订于1939年7月24日的“有田—克莱琪协定”, 是英国与日本在为解决天津事件所举行的东京谈判之初达成的一份备忘录。这个协定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凸显了英国政府以损害中国利益换取对日妥协的意图, 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批评。对于这个英日协定及其母体天津事件、东京谈判等问题, 学术界曾做过不少研究, 只是视野很少跳出外交史层面, 以致当时的民众情绪与社会舆论往往被置于背景或从属位置, 甚至一些智慧阶层人士极有价值的思

考也被忽略或淡忘。然而, “有田—克莱琪协定”并非仅仅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英日首次外交危机的产物, 它实际上折射着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一些大国在中日战争和远东问题上的多种矛盾。本人是在从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时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故拟以这所战时最高学府国际问题专家对“有田—克莱琪协定”及其英日中关系的观察与评析, 作以必要梳理和考察。

一 “有田—克莱琪协定”在西南联大的反响

1939年4月9日,天津伪联合储备银行与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爱国人士刺杀毙命,由此导致了英日关系紧张的“天津事件”。天津事件发生前的当年2月,日本扶植的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録及亲日财界要人李国杰,先后在上海租界遭到暗杀,另两名日本军人也在租界受到袭击。一直碍于有关条约约束不能在租界肆意妄为的日本,借此曾向英美政府提出日本警察可随时随地在租界内采取行动的蛮横要求,而天津事件的发生,给了日本又一个压迫英国的借口。

在近代中国的畸形社会中,租界是个非常特殊的区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沦陷区人民一直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坚持抗日斗争。位于天津市中部、占地6369余亩的英租界,是英国在华北的经济与金融中心,这里集中了列强开设的数百家银行、洋行及工厂,号称英国“皇家四大行”的怡和、太古、仁记、新泰兴银行都在这里设有分行,因而天津英租界早就是日本觊觎的对象。

天津事件发生后,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了4名涉嫌人,日方遂要求将他们送交伪地方法院审判。围绕着是否移交刺程案嫌疑人,英日间展开交涉。中国希望英方不要交出,并保证以后不在英租界引起纠纷。英国外交部提出折衷建议,希望由英、日、美三国组成调查委员会,以确认4名涉嫌者是否有罪。但是,日本显然企图以此为由夺取租界控制权,因此拒绝了英国建议,并于5月31日发出最后通牒,限6月7日12时前就引渡一事作出答复。6月6日,英国驻天津总领事代表英国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恼羞成怒的日本天津驻军,于6月14日悍然封锁天津英租界,从而演成七七事变爆发后英日关系的首次严重危机。面对日本对天津租界的封锁和在各地发动的反英运动,英国考虑到欧洲大战爆发在即,无力东顾,被迫同意进行谈判。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务省大臣有田八郎于7月15日举行的东京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

东京谈判伊始,日方首先提出要确定一个原则性协议,要求英国承认中国目前存在的特殊战争局面,接受日军可以采取自认为最合适的办法来应付中日冲突的做法。这个要求显然有意扩

大谈判范围,旨在迫使英国承认日本侵占中国的既成事实。英方则认为天津事件属于地方性质,主张谈判应当就事论事,不涉及整个中国问题。但是,绥靖政策指导下的英国政府,最终还是担心谈判破裂,造成英日对抗,遂做出让步姿态,满足了日方要求。7月24日,英日达成原则性协议,即引起世界强烈反响的“有田—克莱琪协定”,其文为:“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之实际局势,在此种局势继续存在之时,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侵占区内之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时知悉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英国政府将趁此时机,对在华之英当局及英侨说明此点,令其勿采取此项行动与措置,以证实英国在此方面所取之政策。”^①

对日妥协的“有田—克莱琪协定”,是英国张伯伦内阁绥靖政策的产物。尽管张伯伦在下院解释协议内容时,强调这只是“为利于英日讨论天津事件”,与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无关,但是协定的文字无疑等于英国事实上承认日本侵华的合法性,因此不能不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2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重要声明,“对于英国政府在此次东京会谈所采取之态度,不能不引为失望”;对“英国政府对于在华日军所谓特殊需要,竟声明知悉,是不能不深引为憾”;对“英国政府又担任使在华英国当局及英国侨民明悉彼等应避免任何阻碍达到日本军队目的之行动或办法,尤堪讶异”。同时,要求“英政府对于所谓天津局部问题之讨论,必将采取一种态度,符合其法律上及道德上对华之责任,并以行动表明其对于日本在华侵略造成之局势,决不变更其固有之政策”。^②

“有田—克莱琪协定”公布后,始终关注东京谈判的西南联大和中国民众一样,立即表示出唾

① 《张伯伦声明英不阻碍日寇侵略,仍称不变更对华政策,东京会谈之内容如此》,《中央日报》“重庆各报联合版”,1939年7月26日,第3版。“有田—克莱琪协定”有多种译本,其中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有此译文,两者文字略有异,但内容相同。本文征引中央社消息,是因国内评论均以此为据。

② 《我外部对东京谈判发表重要声明,英国态度颇使我失望》,《中央日报》“重庆各报联合版”,1939年7月26日,第2版。

弃态度。关心国际局势是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何况其成员之一南开大学就来自天津。“有田—克莱琪协定”是1939年7月24日在东京签订的,25日中国各报仅披露了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院对诸议员质询的回答。协定的正式文本及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是26日才同时见诸国内报端。28日上午,距英日协定消息传到中国中间仅隔一天,政治系教授钱端升便应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约请,在文林街联大师范学院做了题为《东京英日谈判与最近国际形势》的演讲。^①

钱端升是著名政治学家,1919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钱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并于1934年初出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在日本侵略华北根据地的天津,钱端升不为所惧,撰写了大量宣传抗日、抨击对日妥协的社论,由此得罪了日本势力,不到两年便被迫离开。^②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派遣了一些民间人士出国宣传,争取国际同情,钱端升是首批以非官方身分派往欧美诸国的三位使者之一。^③1937年9月中旬至1938年8月下旬,钱端升用近一年时间周游了美、法、英、瑞士等国,考察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外交政策。其间,他被国内推选为出席伦敦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代表^④,还曾被考虑留在欧洲主持统一宣传工作的负责人^⑤。因此,说他是当时国内对英日协定最有发言权的专家并不过分。而钱端升的这次演讲,也不仅是西南联大甚至可能是全昆明第一个对“有田—克莱琪协定”的公开剖析,它对人们了解英日关系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确有不小帮助。

钱端升的演讲,可能是昆明国立专科以上学校一次行动的准备。7月30日,钱端升讲演后第二天,昆明国立专科以上各校学生代表在英日协定签订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了抗战爆发后昆明地区学界的首次联合大会。大会在云南大学召开,会上一致通过了两个宣言,其一是以“对英国与日成立初步协定表示失望”为中心内容的宣言^⑥。署名者中,列于首位者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自治会,其后依次是国立云南大学全体学生、国立同济大学战地服务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国立体育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这是一份西南联大历史的珍贵文献,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界对于国际关系的一次重要表态。鉴于这个宣言在迄今为止西南联大各类

史料中均未收入,故特录全文予以存真:

我们对于本月二十五日英日东京谈判的初步协议,特发表如下的宣言。我们认为英政府在此次英日协议中所采取的态度,不仅不能阻遏日寇独裁东亚的野心,反足以助长侵略的凶焰,危害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威望。尤使我们而深以为憾者,乃英政府竟不顾迭次有国联会议中所提的确保,即避免采取足以减弱中国抵抗力量的任何行动,并对于援助中国之各种办法尽量使其有效。目前英日协议中英政府所采取的办法,又恰恰与此背道而驰。我们向以英国为最可信赖的友邦之一,而如今英政府的态度和办法,我们认为对于中英两国的友谊无异投下一层阴影,将不能有所增进。我们深信英政府的失策,实不足以代表大多数爱护正义拥护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英国人民,我们要求他们继续发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伟大的传统精神,站在公理和人道的立场上,一面督促政府,检讨过去的失策,一面和我们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人民紧紧的拉起手来,为反抗侵略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最后我们更愿劝告世界各友邦的人士,中国艰苦卓绝地担任反侵略的先锋,已经两年多了,我们今后无论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一定要遵奉我们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训示,以加倍的努力来支持下去,直到我们驱除日寇,和全国人民一致信仰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立。^⑦

- ① 《钱端升今在联大师范讲演》,昆明《益世报》,1939年7月28日,第4版。该报道仅为简短消息,未刊登演讲内容。8月6日,钱端升在《今日评论》第2卷第7期发表《英美对日外交的新变化》,从时间上推测,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次演讲的内容。
- ② 钱端升:《我的自述》,《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697页。
- ③ 与钱端升一起以非官方身份派往欧美宣传的另两位是胡适与张忠绶,他们和钱端升都是北京大学教授。其中胡适后来出使中国驻美大使,但西南联大一直保持着他的教职。张忠绶的名字也保留在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教员名册中,只是他回国后没有到西南联大,而是就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 ④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武汉日报》,1938年1月24日。
- ⑤ 《王世杰日记》1938年2月11日。文中云:“晚间函朱骝先兄(内定使德)商欧洲方面宣传机关之组织。予意最好在英德法各设一永久性之机关,以统一宣传工作,并提议请钱端升主其事。”
- ⑥ 这次昆明国立专科以上各校学生代表大会通过的另一个宣言,是以“对美国废止美日商约表示赞佩”为中心的宣言。这个问题与英日“有田—克莱琪协定”直接相关,但因本文篇幅所限,留待另文介绍。
- ⑦ 《昆明学界发表宣言,对美国废约表赞佩,对英国妥协表示失望》,《中央日报》“重庆各报联合版”,1939年8月1日,第2版。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署名的这个宣言,反映了社会各界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愤慨。这种愤怒完全可以理解。正如有人所说:东京谈判开始时日本就声称外交取得胜利,说英国谅解了日本对华政策、承认华北傀儡组织、承认日本在华造成的既成事实、放弃援华政策等。对于这些,人们认定是日寇惯用的欺骗伎俩,但看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后,才确知英国果然如此妥协,尽管这还不是东京谈判的最后结果,但“依据此种谅解而进行的会议,其大为不利于中国,殆可预知”,因此不由得“大为惊异,大为失望”。^①

二 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批判

在社会舆论对“有田—克莱琪协定”的反应中,罗隆基撰写的批判文章十分突出。罗隆基时任天津迁至昆明的《益世报》总编辑,同时任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在他主持下,《益世报》不仅刊登了大量关于东京谈判的报道,发表了多篇学人评论,而且他本人也以社论主撰(执笔人)的身份,撰写了一些尖锐深刻的社论。这些社论集中反映了国内舆论的主流意见,其中尤以“有田—克莱琪协定”公布后接连发表的三篇社论最为有力。

7月26日发表的《对英国的严重抗议》,是罗隆基站在中国国民立场上撰写的第一篇社论。它除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外,着重从四个方面对协定提出质疑。文章指出:一,协定英文使用的“Regions under their control”,“按原意应是日寇控制区域,不限于占领区域,更不限于天津,这与英国列次所声明东京会议只讨论天津问题一点,大不符合”。二,“英国承认日军在华有保障自身安全之一切特殊需求,并承认日寇有在占领区维持公共治安之一切特殊需求,这等于英国承认日寇在华的武力造成的一切既成事实”。而所谓“特殊需求”一词空泛无边,“将来当然由日寇随意指定,随意提出”,如此,“则英国虽中立地位亦不能保持,而成为援日矣”。三,“英国承认日寇可以取缔并清除一切妨害日军目的之行为与因素,且可以取缔并清除有利‘他们的敌人’(指中国)之行为与因素”。这里不称中国,而称之“他们的敌人”,“似英国已站在日本立场”。如若这样,那么包括英国人在内的一切人,“凡有妨碍日寇目的者,凡进行有利于中国之行动者,均在取缔清除之列”。这种文词,“又越出中立范

围,而实行援日矣”。四,“英国声明绝不与日寇上项目的有损害之行为,且将此旨宣示英国在华当局及在华侨民”。按此解释,“不但英国放弃援华政策,英国且协助日寇达其侵华目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英国不止政府放弃援华政策,即在华英侨,凡有对中国抗战表同情者,亦在制止之列”。根据这些分析,文章斥责“备忘录之内容,其严重性质不可思议”,并批评英国的这种态度,“不但不是援华,实已不是中立;不止不是中立,实已公开援日”^②。因此,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严正抗议。

7月27日,罗隆基为《益世报》撰写的第二篇社论《英国在远东的前途》发表。其中心是从英国本身切身利益立场出发,指出英国在东京谈判中企图以退让屈服保全英国远东权益的目的,根本不可能到达。文章列其理由道:其一,从中国方面说,在中国国家存亡、民族生死的紧要关头,英国负义背信,自居于日寇“同谋犯”之列,这是中国国民不能轻易原谅和轻易遗忘的。这种负义背信,很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使人想到鸦片战争,想到“五卅”惨案,想到万县惨案,更想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英国在国联会议上的袒日行为,甚至由此“对英国之反感,或更甚于日寇与傀儡之仇英”。其二,从沦陷区说,不仅鼓励傀儡汉奸,即使是沦陷区的人民,也可能在英国对日妥协刺激下,卷入日寇操纵的反英运动,这实际上是英国自食其恶果。其三,从日寇方面说,“日寇侵华野心与英国远东权益相冲突”乃彰明之事实,“今日寇乃自命独霸一方之强盗,而英国之权益,正是日寇独霸一方之障碍,日英间之妥协,乃切身利益上绝不可能之事”,英日在远东的利益冲突根本不可能避免,“倘英国在远东以屈服退让于日寇为政策,则英国退出远东之日,方是日英完全妥协之时”。其四,从列强方面说,英法美三国均是在远东享有权益的国家,为了保全这些权利,过去三国都是采取平行行动。现在,英国单独在东京向日寇屈服退让,“必不为列强所直乃在意中”。可见,“今后英国在远东,被压迫于日寇,树怨于中国,见疑于列强,而成孤立之局”,这正如美国评论所说“英国在远东之威

①② 《对英国的严重抗议》,昆明《益世报》社论,1939年7月26日,第2版。

望,正如夕阳之西堕”。^①

罗隆基针对英国对日妥协撰写的第三篇社论,是7月28日发表的《英负延长远东战事责任》。作为这一问题的压篇之作,文章指出英国对日妥协的现行政策,产生了延长远东战事的恶劣作用,英国应对此负责。该文副标题为《蝙蝠式外交政策的结果》,这是因为文中叙述了一则寓言:一个飞禽与野兽相伴,蝙蝠介于其间。它飞到飞禽旁说“我有两翼,愿助禽”;接着又走到野兽旁说“我有四脚,愿助兽”。蝙蝠以为这是两援之策,可其结果“禽以蝙蝠忠于兽,兽以蝙蝠忠于禽,蝙蝠各方被逐”。文章说,当前的形势,英国恰似寓言中的蝙蝠,扮演了一味“求两全之计者”的角色,但是,结果难免“终归而败”。^②

上述三篇社论,首先对英日协定的文字进行分析,揭露英国的所谓中立政策,实质上起着助长日本侵略的作用。其次从英国自身利益出发,指出这种现实主义完全背离实际,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感,也必然损害英国与反侵略集团各国的关系。最后,批评英国的妥协政策,对维护国际正义与和平造成的严重作用。三文侧重不同,但环环相接,步步深入,是当时国内舆论界对“有田一克莱琪协定”最为完整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以来,英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本是可圈可点。但是,由于“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对中国造成损害,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对英国历史行径的清算。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蔡维藩就不客气地挖苦到,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宣布“不承认主义”,而英国则作壁上观,令美国大感失望,对其大加讽刺^③。罗隆基也指出,国联会议曾决议援华抗战,不承认日寇在华武力造成之事实。“英国为盟约国重要分子,且以拥护国联自任”,却在“有田一克莱琪协定”中“承认日寇在华一切既成事实,且声明不作任何行动,以损害日寇在华目的”。这不仅“与国联盟约之文字与精神大相违背”,“与国联数年来一切决议亦大相违背”。他不由气愤地质问:英国“今所为如此,将何以自解”?“何以见信于天下”?^④钱端升也从九一八事变时英国在国联会议的态度,历数英国抹杀九国公约、国联盟约、非战公约的行径,又联系到去岁张伯伦内阁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主权的慕尼黑协定,认为英国“不尊重条约义务,任令侵略国撕毁条约”,而这次英日协定又“认日贼作友人”,方进一步造成了其国际地位的日渐衰落。^⑤

当时,国际舆论对英国妥协也多嗤之以鼻。美国报纸认为“英国在华之威望已如夕阳之西堕”^⑥,德国报纸也认为这是“英国之耻辱”^⑦。西南联大知识精英的评论,可以说是国际舆论的有力注脚。

不过,取得美国伊立诺大学硕士学位的蔡维藩,并不像一般舆论那样激愤。他根据冷静的观察,认为从“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字面上看,最重要的有两点,即:一,英国政府对于在华日军之所谓特殊需要,声明知悉;二,英国政府担任使在华英国当局及英国侨民,悉彼等应避免在任何阻碍达到日本军队目的之行动或办法。但是,“日军之所谓特殊需要”究竟是什么需要,“是不是一经日军认定,英国即予以承认”,这是一大疑问。又,所谓“知悉”怎样理解,“既经‘声明知悉’,是否继之以行动;如需行动,怎样行动”,也是一个疑问。还有,所谓“英国政府担任使在华英国当局及英国侨民,悉彼等应避免任何阻碍达到日本军队目的之行动或办法”又应作如何解释,日本军队的目的是什么,由谁确定,英日双方也有各自理解。“假若日本军队今日认为他们的目的在于消灭租界内中国爱国人民,英国是否听其随意逮捕?假若明日认为英侨在中国足以妨害他们的目的,英政府是否撤退所有侨民,放弃所有权益?”这不又是一个疑问吗?^⑧因此,蔡维藩认为对英国妥协是应该气愤的,但也不必过度悲观。

三 冷静分析英日在华矛盾

“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引起的中国和国际批评,只是社会舆论的情绪性反应。至于协定背后究竟包含着哪些问题,似乎更值得深思。

① 《英国在远东的前途》,昆明《益世报》社论,1939年7月27日,第2版。

② 《英负延长远东战事责任——蝙蝠式外交政策的结果》,昆明《益世报》社论,1939年7月28日,第2版。

③ 蔡涤生:《英倭谈判影响的臆测》,《云南日报》“星期论文”,1939年7月30日,第2版。蔡涤生是蔡维藩的字。

④ 《对英国的严重抗议》,昆明《益世报》社论,1939年7月26日,第2版。

⑤ 钱端升:《英美对日外交的新变化》,《今日评论》第2卷第7期,1939年8月6日。

⑥⑦ 《美报评英威望如夕阳之西堕》,引中央社纽约25日路透电,昆明《益世报》1939年7月26日,第3版。

⑧ 蔡涤生:《英倭谈判影响的臆测》,《云南日报》“星期论文”,1939年7月30日,第2版。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历史系年轻教授王信忠(亦名王迅中),是西南联大少有的日本问题专家,他对日本做过长期不懈的观察,几乎对日本政治、外交的所有变化都发表过专题评论。他认为,“当前敌国国策上一个最大的问题,便是如何结束战事,保持占领区域”。诱使中国投降当然是结束战事的最佳出路,但是对于日本提出的“东亚新秩序”及“中日国交调整大纲”两次诱和声明,中国政府均痛加驳斥。于是,日本不得不采取第二种办法,即“设法与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列强妥协,诱使或压迫它们承认日本所制造的现成局面”。

接着,王信忠指出了日本采取第二种办法的历史原因。他说:日本“过去将近七十年间大陆政策的所以不能完全达到目的,与其说是由于中国的抵抗,勿宁说是由于列强的阻挠”。如,甲午战争后由于俄德法的干涉,使其不得不将辽东半岛吐还中国。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及收回山东权利两项要求虽未得到通过,但1921年华盛顿会议与1922年九国公约的签订,均表示要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表示维持各国在华的商业机会,结果在门户开放原则下,山东问题经英美调停,青岛归还中国,胶济路亦由中国赎回,致使二十一条无形取消。日本正是吸取了这一教训,方在“武力强占我领土之后”,开始“在列强方面做外交工作”。^①

对于王信忠分析的英日在华矛盾,罗隆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日本封锁天津英租界,是其为了应付侵华失败采取的一个措施。他追述了日军侵华的军事计划与经济计划,说其直至本年6月,既未能直趋西北西南,也未能威迫四川,而封锁海口和发行伪币亦未能破坏中国的金融财政。相反,日本自身在军事与经济上却都接近崩溃点。这种现实使日本痛感“倘英法美等国履行条约之责任与义务,真实援华抗战,则中国胜利必可获得,而远东战事必告结束”。于是,日本不得不“变更策略,突向列强中之英国加以威胁,此奇兵断援之计”,以使“军事与经济又多一喘息机会”。日本封锁天津英租界和促成东京谈判,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步骤。^②

日本的目的能否达到暂且不说,但有一个问题十分清楚,便是英国的妥协,受损害最大的不是中国,而是英国本身。钱端升说,“仔细研究一下,则到现在为止,英日双方七月二十四日所发

表的英日议定书,其对于英国的损害,实无止十倍百倍于对我的损害”^③。正因如此,王信忠认为英国的妥协让步尽管是“徒然白送礼物”,但其让步必然“与暴日的企望相差甚远”^④。

说到这里,势必要与即将进入实质性内容的东京谈判联系起来。“有田—克莱琪协定”只是英日双方在东京谈判初期达成的一个备忘录性质的文件,它只是满足了日本对启动谈判提出的某些原则或先决条件。关于谈判的正式内容,由于尚未公布,所以只能根据个人观察进行推测。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政治系教授崔书琴估计,从日本方面说,它想谈判的细目大约有四:“(一)承认日本的交战国权利并停止援助中国;(二)交出白银,并使租界内银行银号都服从伪组织的法令;(三)引渡‘犯人’并与英国共同管理英租界;(四)扩大日本参加管理上海公共租界的权限。”但是,崔书琴认为英国不可能全部接受这些要求。他论证到: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没有对日本宣战,因此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战争,英国可以以此为由,不承认日本有交战国的权利,否则其远东贸易与运输业必受极大影响。对于第二个问题,日本封锁天津英租界的主要动机是要求交出中国国家银行存在天津英租界的四五千万元白银,用它购买军火或拨给伪银行充实准备金。由于这些白银已在日本严密监视之下,很难运出天津,因此虽然英国政府一再声明决不交出,但最后仍有可能做出让步。至于第三个问题,人们都知道引渡刺程案嫌疑人不过是日本发动天津事件的表面原因,日本的真正企图是参加英租界的行政管理。对于善于变通的英国,极可能满足日本的这个要求,以避免谈判破裂。对于扩大日本参加管理上海公共租界的权限,崔书琴承认这只是他本人的猜测,不一定在谈判范围内,因为上海租界是公共租界,不是英国一家做得了主的。^⑤

① 王迅中:《日本外交的新阴谋》,《今日评论》第2卷第9期,1939年8月20日。

② 《英负延长远东战事责任——蝙蝠式外交政策的结果》,昆明《益世报》社论,1939年7月28日,第2版。

③ 钱端升:《英美对日外交的新变化》,《今日评论》第2卷第7期,1939年8月6日。

④ 迅:《英日谈判展望》,《今日评论》第2卷第8期“时评”,1939年8月13日。

⑤ 崔书琴:《英国屈膝以后》,昆明《益世报》“星期论文”,1939年7月30日,第2版。

崔书琴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此后进行的东京正式谈判中,英国果然抓大放小,没有接受日本参加租界管理的要求。但是,它也不顾中国反对,于1939年8月上旬向日本引渡了刺程案4位嫌疑人。在白银问题上,1940年6月12日在欧洲战场大败的英国急于在远东对日妥协,与日本签订了天津协定,同意将存银封存于天津交通银行,并拨出相当10万英镑的数目用于华北救灾,同时允许华北伪政权发行的“联银券”可与法币同时在租界流通。日本在英国做出这些让步后,解除了对天津英租界的封锁。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英国的妥协态度都是令人不能忍受的。但是,“有田—克莱琪协定”不过是英国一贯外交政策的一个表现,并且受到它在欧洲战场不利困境的制约,这是举世皆知的客观现实,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透过表面现象的迷惑,正确把握英国对华政策的实质与走向。对于这个问题,西南联大的国际关系专家,亦有清晰的分析。

《论外交根本政策》可能是钱端升1938年8月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国际关系评论。他在文中说:英国的基本外交政策,一是“在防止欧陆产生一个足以威胁三岛安全的国家或集团”,二是“维持英国在世界各地巨大的商业利益”。此政策已经存在三四百年,其对外或和或战,或亲德或亲法,都是在这个政策指导下随着形势演变而变化的。^① 号称“日不落王国”的英国,是当年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其地位犹如今天的美国。因此,蔡维藩认为“英国的利益遍及世界,任何部分的纷扰对它都有害而无利,所以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甚至必要时也可以牺牲自己的若干利益”。他接着说,纵观19世纪近东外交史,英国凡是在欧洲与远东同时受到威胁时,就权衡轻重缓急,择其轻者先求和平解决。“如欧洲方面走得通,先解决欧洲问题,否则转向远东方面而求解决”。如仍走不通,“则转向欧洲努力,努力失败,它可以再向远东努力”。正因如此,英国是一再转向,随时转向,皆因“它最怕同时遭受欧洲和远东两方面的威胁,更怕两方面互声援竞相提高对它的威胁,尤其怕两方面同时发动战争,迫使它无力兼顾东西”。^②

对于英国的这种对外政策,法律系教授罗文干的认识也颇深刻。有丰富从政经历的罗文干,在群情激愤的舆论中,能冷静地看到英国为维护

自身利益的某些现实需要,并认为英国为了在远东与日本争夺势力范围,对日本主要实行的是抑制立场。罗文干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在国联会议上一再袒护日本,反对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的抑日主张;但华北危机时,则有感于日本大陆政策对其产生的威胁,于是协助中国改革币制、修建粤汉铁路;抗战两年来,英国亦“为我运输军火,代我保存白银,舆论同情于我,政府借款接济”等等。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英与我邦交日亲,而倭与英感情亦日恶”,虽然保守党上台后,张伯伦内阁实行绥靖政策,以屈辱求苟安,但德国、意大利侵略扩展永无止境,日本乘虚而入,都不能不令英国感到压迫。这次“有田—克莱琪协定”,也是由于英国的重心在欧洲,不敢调舰东来,才不得已再次低首,与日本达成妥协协定。^③ 罗文干的这些分析,似乎有悖时论,却体现了正视客观形势,敢于发表不同见解的勇气。其实,钱端升也承认“英美人民对于中日战争的态度,自战事开始以来,一向是渐渐地亲中国,袒中国,敬服中国,远日本,抑日本,憎恶日本”。原因很简单,英国毕竟“在远东利益要大些,被日本糟蹋也要大些,所以其人民助华抑日的趋势也大些”。^④

蔡维藩、罗文干的上述观点,得到崔书琴的认同。“有田—克莱琪协定”公布伊始,崔书琴就提出三个问题:“英日关系是否从此就能改善”,“英国此后是否就要放弃援华政策”,“法美苏三国的远东政策是否也要发生变动”。这表明他把他的思考重点,放在“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方面。其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对日妥协虽是日本的初步成功,但“绝不能证明两国关系从此便能改善”,这不只由于“英日谈判未见得即能圆满结束”,更重要的是“即令能暂时成立妥协,两国的根本冲突还是不能消除”。^⑤

① 钱端升:《论外交根本政策》,《新民族》第2卷第13期,1938年10月9日。该文复于11月11、13日在《云南日报》发表,说明作者非常看重此文。

② 蔡涤生:《英倭谈判影响的臆测》,《云南日报》“星期论文”,1939年7月30日,第2版。

③ 罗文干:《英倭会议美倭废约与中国抗战之关系》,昆明《益世报》“专论”,1939年7月31日。

④ 钱端升:《英美对日外交的新变化》,《今日评论》第2卷第7期,1939年8月6日。

⑤ 崔书琴:《英国屈膝以后》,昆明《益世报》“星期论文”,1939年7月30日,第2版。

从以上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对于英日在华矛盾的评论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的观察角度、涉及问题各有侧重,但得出的结论却异常一致。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的论述,还都隐藏着这样一层意味:尽管英国对日妥协损害了中国利益,但也不必大惊小怪。

四 坚定抗战意志是争取胜利的根本保证

认为“有田—克莱琪协定”不值得大惊小怪,不是面对英国妥协的无奈自慰。相反,它表现的是一种立足自身,依靠自身力量坚持抗战的信心。

“有田—克莱琪协定”公布后,不少人曾担心从此英国会停止援华。对于这种担心,崔书琴很不以为然。他说:“国际间无所谓真正的援助,如有援助,也必是为了援助国自己的利益。”英国帮助中国改革币制,“无非使其与英镑发生联系而便利她的对华贸易”,“维持港粤间的交通,无非使香港大发中国的国难财”。如果中国失败,“英国的在华权益必难继续维持”,因此英国为了目前与将来的利益,“还是要继续援助我国的”。^①

“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后不几天,国际出现了两个重大事件。7月27日,美国政府通知日本政府,宣布废止1911年两国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同日,中英签订三百万英镑新借款协议。对于前者,舆论一致认为这是“自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对远东采用强硬态度最重要的一页”^②,其“与远东乃至全世界有重大关系”^③。美国废止美日商约,表面上与英日东京谈判没有必然联系,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它既对英国妥协态度表示了不满,也是对日本的警告。而中英借款的成立,显然是英国对美国对日强硬态度的回应。这两个同时出现于“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后第三天的事件,可以说是对正在得意洋洋的日本当头一棒。

面对这种有利中国的形势,罗文干并未过分乐观,但说起话来自然更加硬气。他说,且不说张伯伦已在英国国会表示对外政策不会改变,也不说英国已经答应向中国借款三百万,即便张伯伦食言,而“我仍能战,于我何损”。即使借款不到,也不可能“陷我法币于绝境”。况且“我军火已有存储,无须候款购买”,加上“今年收成甚丰,后方粮食充足”,实“不足以影响我抗战”。罗文

干是从晚清走过来的人,文章中保持了前清用语的一些习惯。他说:“我抗战,既为永久是非而战,不为目前利害而战,则一切国际变化,于我利则‘知道了’,不利亦‘知道了’”。^④

罗文干这种很长志气的语调和神态,在西南联大不乏其人。蔡维藩说,“今后远东现实改变,无疑的我们的责任极其重大”,我们只有“抱定‘天助自助者’的精神,咬牙苦干”,方能“以奠定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有一分胜利,英国必勇于承认一分,有全盘的胜利,它也必勇于承认全盘”。^⑤这种不依赖外援,立足自力更生的态度,表明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抗战必胜的意志,发展持久的抗战力量,不仅可以促使英国妥协政策的转变,而且也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英日“有田—克莱琪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爆发前国际关系的一次重要事件,由于它的导火线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天津事件,也由于这次事件导致的英日东京谈判反映了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从而引起中国民众的极大关注。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对这一事件的观察,反应了中国智慧阶层对如何认识国际关系演变和怎样坚持抗战的深层思考。把他们的分析评论从一般性的民间情绪中剥离出来做以独立考察,不只超越了迄今为止本专题及相关专题研究所依赖的克制外交行为,而且也有助于从更广阔视野上,反映中国民众对于国际变化与中国抗战关系的认识。

收稿日期 2009—03—25

作者闻黎明,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公羽】

- ① 崔书琴:《英国屈膝以后》,昆明《益世报》“星期论文”,1939年7月30日,第2版。
- ② 《告美国朝野人士》,《云南日报》社论,1939年7月29日,第2版。
- ③ 《美日商约废止》,《中央日报》评论,“重庆各报联合版”1939年7月28日,第2版。
- ④ 罗文干:《英倭会议美倭废约与中国抗战之关系》,昆明《益世报》“专论”,1939年7月31日。
- ⑤ 蔡涤生:《英倭谈判影响的臆测》,《云南日报》“星期论文”,1939年7月30日,第3版。